

LE DROIT,
NOUVELLE ARME DE
GUERRE ÉCONOMIQUE

隱秘戰爭

[法] 阿里·拉伊迪 (Ali Laïdi) ©著 法意 ©譯

獻給我的天使，本書的第一位忠實讀者。

獻給我的小女兒，我的巴布，

為了未來的某一天，公道得以戰勝法律……

即使是最強者也絕不會強大到能永遠做主人，
除非他將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
——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

目 錄

引 言 001

第一部分

“山姆大叔”的域外管轄 / 015

1. 《反海外腐敗法》——全世界圍捕腐敗企業 / 019
2. 以法律為武器實施經濟制裁 / 037
3. 超級貿易保護主義性質的法律“武器庫” / 067
4. 是檢察官的事，而非法官的 / 081
5. 怒火中燒的法國議員 / 107
6. 法國司法體系的美國化 / 115

第二部分

美國法律：無情的經濟戰武器 / 123

7. 在劫難逃的歐洲企業 / 125
8. 空中巴士，美國檢察官的下一目標？ / 149
9. 出色的監察者和追捕者 / 163
10. 提心吊膽：英美律師事務所的統治 / 171

第三部分

華盛頓堅決要使歐洲經濟處於其從屬地位 / 193

11. 以搜集全球經濟情報為目的的法律 / 195

12. 經濟戰前線的美國情報部門 / 213

13. 腐敗，一種過時的作法！ / 237

14. 癱瘓的歐洲 / 255

15. 癱瘓的法國 / 269

結 論 283

引 言

這是 19 世紀末由皮埃爾·阿扎里亞和保羅·比才創立的一家法國公司的故事。這家公司從製造電纜、電器、電池起步，逐步拓展到生產用於水利工程、核設施、建築工程和交通設施（道路、橋樑等）的渦輪機。1968 年，這家公司兼併了電信公司阿爾卡特，開始涉足電話、計算機、手機、網絡連接器等業務。1969 年，它兼併了阿爾斯通——一家生產機車和發動機的公司，並於三年後建成了當時全世界最快的列車——TGV 高速列車。在此期間，它還接管了對建築和公共工程部門頗為重要的企業總公司，即萬喜集團的前身。此後，這家公司還把建造大型民用和軍用船隻的大西洋造船廠收入旗下。1982 年，法國社會黨人對這家公司進行了國有化，但這並沒有使它的龐大胃口和光輝夢想受阻。1983 年，它兼併了湯姆森半導體公司的電信業務。1986 年，它進入民用核工業領域，收購了法馬通公司（即阿海琺公司的前

身)¹40%的股份。柏林牆的倒塌使這家公司如遇風口，它雄心勃勃，想要征服世界。

這家公司就是 CGE（法國電力總公司）。它是一個龐大的企業集團，與國際上的眾多競爭對手相比毫不遜色。在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CGE 是法國工業的驕傲。它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家重建，從而使法國免於經濟停滯，邁入了大國的行列。CGE 的競爭對手是美國通用電氣、德國 AEG（電器品牌）和西門子等世界巨頭。這是一個真正的法國成功故事，當然，首先應當歸功於各高等專業學院培養出的精英（尤其是工程師）。這些聰明的頭腦與戰後法國領導人的政治遠見實現了完美的融合，兩者共同重建了法國的工業和經濟主權——此前在“二戰”中，在被德國佔領的六年裡，法國的工業和經濟都曾遭到嚴重破壞。

但在誕生一個世紀後，CGE 已經蕩然無存。它在 1987 年的私有化運動中被拆分，變成了幾家獨立的公司：阿爾卡特、萬喜、西技萊克、湯姆森、大西洋造船廠、阿爾斯通……但這些後繼者的命運卻與 CGE 截然不同，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步入衰敗的境地。阿爾卡特始終默默無聞，² 在與美國朗訊進行了災難性的合併後，它投入了芬蘭公司諾基亞的懷抱。同樣，大西洋造船廠在與韓國 STX 集團分道揚鑣後，被納入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團麾下。在經歷了長期無望的掙扎後，湯姆森品牌被一位試圖重振計算機和平板電腦業務的法國投資者收購。阿爾斯通也不再屬於法國：能源業

務被出售給美國，而交通業務被出售給德國^①。一代傳奇 CGE 就此謝幕。

20 世紀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的這段時間不僅對 CGE 是致命的，對整個法國的工業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法國工業企業紛紛“外逃”到更歡迎它們的國家和地區，只留下了失業問題、排外情緒和民粹主義的升溫。但是人們卻遲遲沒能察覺到這一切，直到阿爾斯通被拆分後，法國國家領導人才如夢初醒。2014 年，阿爾斯通能源業務被出售給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引發了法國國民議會的不滿。在野黨的右翼黨派成員希望舉行辯論，甚至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但是，由於他們缺乏政治決斷，這一請求最終不了了之。三年後，阿爾斯通的處境跌入谷底，又將交通業務出售給德國企業西門子。這一次，法國議員終於不再袖手旁觀。國民議會和參議院都行動起來了，每一個人都開始討論法國去工業化的原因：波旁宮^②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盧森堡宮^③也派出了一個調查團。

2018 年春天，兩院提交了各自的報告，尖銳地批評了奉行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政治精英和行政人員。人民運動聯盟黨議員、調查委員會主席奧利維爾·馬萊克斯寫道：“經過 6 個月的調查，

① 德國西門子想收購阿爾斯通的交通業務，但該收購案未獲歐盟競爭委員會通過。——譯者註

② 波旁宮即法國國民議會所在地。——譯者註

③ 盧森堡宮即法國參議院所在地。——譯者註

我十分確信，在批准通用電氣收購阿爾斯通這一決定上，法國未能保護本國的國家利益。”³ 馬萊克斯指責法國外交部、財政部和司法部之間缺乏協調，並強調某些高層官員存在失職行為。他還指出：“阿爾斯通案暴露出法國對美國的域外管轄司法程序缺少認識。”⁴

參議員同樣對因試圖“拯救”阿爾斯通而將它賣給德國人的對策進行了質疑。“這筆交易在資本投入上對西門子極為有利，這顯得頗為可疑。西門子不出一分錢就控制了阿爾斯通，而後者明明還擁有充裕的訂單和穩健的現金流……但是，國家對鐵路站點的維護卻沒有得到充分保障，並在未進行鐵路鑒定的情況下就接受了這些條件，這僅在短短四年之內就變成了現實。”⁵

法國正在摧毀自己的工業。那些本應該守護法國工業的人未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法國政界和經濟界的領導人無法理解這個競爭白熱化的世界，也未能看到競爭對手正在拚命打磨它們的經濟武器。“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最基本的利益都無法保護，那就是徹頭徹尾的盲目、短視和自私。”⁶

在所有這些武器當中，法律是最有殺傷力的武器之一。人們天真地以為法律為正義服務，然而它卻被用於其他目的：為大國的經濟利益服務。雖然法國和歐洲的精英一直密切關注新興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等），但他們沒有發覺自己的主要盟友早已將司法的“兵器庫”填得滿滿當當。這是一種極具侵略性的武器，具有巨大的威力，2010年之後，精英們為此吃盡了苦頭。根據

律師奧利維爾·德邁松·魯熱的說法，法律是“一種攻擊性的武器，是經濟戰中可怕的子彈頭”⁷。巴黎和紐約律師公會的成員，蘇菲·瑟姆拉律師將域外法定義為“一種大規模的司法經濟武器”⁸。

毫無疑問，最強大的司法經濟“戰士”是美國。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將自己的懲罰性立法鋪設到了全世界。這些法律打着懲罰踐踏人權或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或組織的幌子，實際上卻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國的《達馬托法》和 1996 年通過的《赫爾姆斯-伯頓法》。這些立法的官方目的是，禁止企業與美國的敵對國進行任何貿易往來，從而摧毀它們。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國家有：古巴、利比亞、蘇丹、伊朗、伊拉克、朝鮮、緬甸……這些法律禁止任何企業與上述國家進行交易。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強迫政策，企業如果不遵守法令，就會遭到美國政府⁹的追捕。不服從這些法律的企業面臨着很大的風險：針對它們的罰款可能高達數億美元，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數十億美元。服從這種經濟制裁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被完全驅逐出美國市場。對於跨國公司，甚至是稍大一些的中等規模的企業來說，被趕出美國市場無異於被判處死刑。所有不遵守美國法律的企業都將遭受滅頂之災。

如果美國法律僅僅適用於美國公司——正如此前幾十年的情況一樣，那麼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值得世界上其他國家關注。但是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美國《反海外腐敗法》以及針對達

犯禁運令的行為的法律，即《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正在逐漸擴大其域外適用效力。它們適用於所有的企業和個人，“美國警長”打算將它的法律強加給全世界。在法學家布萊克·雷丁 2007 年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他將這種現象比喻成美國西部片中伸張正義的經典橋段，觸犯禁令的罪犯將被驅逐到尚未開發的美國西部荒野中：“這是法律的長臂或美國法律在全球市場上適用的霸權風險。”¹⁰

但是歸根結底，為何不為一部與邪惡做鬥爭的法律擊掌叫好呢——即使它是域外法又有何妨？為甚麼不感謝美國人為整個地球伸張正義呢？問題是他們的干涉行動是否全都是出於匡扶正義的目的，這一點還有待觀察。如果真相確實如此，如果他們對正義的渴望是如此真誠，那麼他們為甚麼不加入負責追捕戰爭罪犯的國際刑事法院呢？¹¹ 難道，商業活動中的公平公正在他們眼中比人權還重要嗎？

美國域外法的癥結在於它的目的。這些法律真的像對外界宣稱的那樣高尚嗎？我對此進行了調查，在許多觀察者¹² 看來，美國法律的對外輸出目的頗為可疑。它絕不僅僅是為了弘揚正義，制裁反民主的政體、腐敗的企業和個人，它還有更多隱蔽性的目的。

安托萬·加拉蓬是法國司法高等研究所的大法官兼秘書長，皮埃爾·塞爾旺-施賴伯是巴黎和紐約律師公會的成員。他們合著的文章是有關這一問題的為數不多的文獻之一。“將域外管轄

權稱為一種全新的治理方式是恰如其分的。這是一種新的使用權力的方式：更加務實、有效，但也更加陰險，它將美國自身的利益和商業道德綁在一起相提並論，甚至混為一談。”¹³

對於研究這一現象的法國國民議會代表團來說，美國域外法確實是一種經濟武器。議員們譴責這是一種“司法行政戰爭機器”¹⁴。他們認為，美國的法律有兩個目標：對目標公司的財務進行沉重的打擊；削弱這些公司的實力，使它們在美國競爭對手可能進行的收購面前變得更加脆弱。這種域外立法是美國地緣經濟戰略¹⁵的組成部分，被視為另一種製造戰爭和捍衛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手段。

這同樣是法國反間諜組織的觀點。2018年11月14日，《費加羅報》頭版報道的標題是“美國是如何監視我國企業的”。文章披露了法國內政部安全總局的一份公文，這份文件認為：“事實表明，美國正在部署一項旨在征服出口市場的戰略——特別是對法國。這一戰略通過具有攻擊性的、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有利的政策而得以實施。”法國內政部安全總局尤其關注的問題是，美國法律被用作國家戰略武器來破壞他國企業的穩定，並用其來搜集他國企業的關鍵信息。¹⁶

全球“司法經濟警察”的表現是如此“傑出”，甚至成功地讓其他國家為美國經濟體系的功能失調付費。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是1929年經濟危機後全球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而由此產生的負債中，有一部分是由各大外國銀行負責償還的。別

忘了究竟是甚麼引發了次貸危機——是華爾街那些蹩腳的“魔法師”發明出的“金融鴉片”。2009—2017年，美國和歐洲各大銀行因違犯美國法律和國際規範而被大西洋兩岸的監管機構處以超過3450億美元的罰款。¹⁷而歐洲銀行為歐洲大陸的監管機構開出了數額高達220億美元的支票。這僅僅佔所有銀行為解決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關的追訴而支付的罰款數額的6%。同一時期，美國監管機構從包括歐洲銀行在內的主要國際銀行手中拿走了1900億美元。這些大銀行還向投訴它們的客戶支付了1330億美元的賠償金。歐洲銀行總共向美國和歐洲的監管機構支付了1250億美元（超過各大銀行罰款總額的1/3），¹⁸其中大部分錢款都流入了美國監管機構的口袋。

首先，請不要誤解，本書的目的不是要為那些被美國追訴的公司開脫，也不是把它們看作受害者。這些公司因腐敗而被追責時，其違法事實（以美國法律的標準來看）往往已經得到證實。許多證據都可以證明法國和歐洲的某些公司確實有違法行為。問題是，這種針對他國公司腐敗行為的追訴是不是破壞外國競爭對手的穩定性和保持美國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障眼法呢？由於與被美國制裁的國家進行貿易往來，許多歐洲企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而美國對古巴和伊朗的大部分制裁措施已經超越了國際法慣例。

事實上，無論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還是其他多邊機構，都沒有像美國對古巴、伊朗甚至俄羅斯那樣實施如此嚴厲的懲罰……另外，一些國際法學家拒絕使用“制裁”這個術語。在他們

看來，制裁應該是國際社會集體實施或通過司法途徑實施的一種行為，而不是單個國家的行為。這些法學家更傾向於將其稱為“單方面的經濟約束措施”¹⁹。但無論稱其為措施還是制裁，結果都是一樣的，例如對法國巴黎銀行的巨額罰款。這家銀行僅因為與伊朗、古巴和蘇丹進行了美元交易，就不得不向美國財政部繳納約90億美元的罰款……而這些交易事實上還是被前述國際機構准許的。接下來，美國人列出的榜單上還有哪些公司？

儘管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證明，伊朗遵守了伊朗核協議的規定，²⁰但特朗普還是在2018年5月8日撕毀協議，拉開了經濟戰的序幕。²¹同日，美國駐德國大使敦促德國企業立即離開伊朗。美國財政部僅允許這些外國企業花幾個月的時間收拾殘局，到11月再離開。違反命令的企業將受到來自美國司法行政部門的追訴，這些追訴可能會導致巨額罰款，甚至讓企業被徹底驅逐出美國市場。

那麼，美國為何可以將本國法律強加於他國公司、起訴外國公司並對它們處以罰款，與此同時卻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了解美國域外法，如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赫爾姆斯-伯頓法》《達馬托法》……它們為甚麼會被制定，又是如何被制定出來的？它們針對的是誰？各國對“山姆大叔”的這種司法入侵做何反應？然後，有必要深入分析美國的司法程序為何可以對違犯禁運令的歐洲國家和歐洲企業進行制裁，包括西門子、阿爾卡特、阿爾斯通、德希尼布等公司，並有可能

在未來波及歐洲航空工業的龍頭——空中巴士。最後，有必要探討美國的經濟戰略，該戰略不僅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還發揮着“世界警察”的作用，使歐洲經濟淪為美國經濟的附庸，並禁止各國與伊朗等被宣佈為“不可往來”的國家進行貿易。

為了撰寫本書，我花了兩年的時間進行調查。作為一名政治學家而不是法學家，我考察了法律如何被用作經濟戰的武器。我對能促使美國域外法輸出的權力關係很感興趣，並使用“域外法”一詞來指代所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具有效力的美國法律。

我與 50 多人進行了接觸。大多數受訪者都同意做證，前提是我要對他們的身份保密。訪談者包括律師、法官、高級管理人員、法國和歐盟的公職人員、警察、情報部門成員、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向我發送了機密文件，一些是應我的要求發送的，一些是主動寄送的。他們同意進行訪談，是因為他們認為時機已到——美國已經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遠了。他們認為，法國和歐洲不能再卑躬屈膝，只有採取強硬的政治措施，才能制止正在轟轟駛向歐洲並危及各國主權的、地獄般的美國經濟戰爭機器。

最後還有一句：研究經濟對抗現象絕不意味着鼓吹經濟戰爭。依本人之見，事實正好相反。20 多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經濟衝突現象，認為這是由全球化引發的“病症”，而且隨着不平等和不平衡現象的加劇，這一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緊迫，甚至失控。本書指出了實施經濟戰的某些做法——無論是國家、企業層面，還是個人層面，目的是提醒這個“病態”的世界，應當警惕經

濟的過度金融化，而且它還受到“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的破壞。超級全球競爭的“毒瘤”正在使人類迷失方向，摧毀我們的星球，摧毀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類。它使一些人從事不道德甚至違法的行為。這不會為全人類帶來任何收穫，卻會讓我們失去一切。揭露這種邪惡，就是為了在一切追悔莫及之前，努力與之進行鬥爭。

註 釋

1. 法馬通公司於 2001 年更名為阿海珐，又於 2018 年 1 月更名為歐安諾。
2. Pierre Suard, *L'Envol saboté d'Alcatel Alsthom*, France-Empire, 2002.
3. Avant-propos d'Olivier Marleix, 19 avril 2018, pp. 2–3.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5/pdf/cr-cepolind/17-18/c1718036.pdf>.
4. 同上，p. 4。
5. “Siemens-Alstom : pour un géant du ferroviaire véritablement franco-allemand”, communiqué de presse, Sénat, 19 avril 2018.
6. Avant-propos d'Olivier Marleix, *op. cit.*, p. 3.
7. Olivier de Maison Rouge, “La géopolitique du droit, l'autre champ de bataille de la guerre économique”, 20 mai 2013, portail de l'Intelligence économique; Synfie, Lettre d'information n°5-T1, 2016, p. 10.
8. “La coopération : une solution pour mettre fin à l'utilisation des législations anticorruption comme des « armes juridico-économiques massives »?”, *Défis* n°9, 2018, p. 53; 該期刊由法國國家安全與司法高等研究院發行。
9. 即英語中的“authorities”。這一術語包括所有有權起訴企業或個人的美國主管機關：司法部的聯邦檢察官，以及某些州的檢察官，例如證券交易所所在的紐約州（紐約州地方檢察官），還有市場監督和監管機構，如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或財政部下轄的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後者負責核查針對禁運國家的經濟制裁措施是否得到了妥善執行。

10. *Revue de droit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n°5, 2007, pp. 659–667.
11. 美國於 1998 年簽署了《羅馬條約》，該條約規定設立國際刑事法院，但美國於 2002 年撤銷了簽字，沒有批准該條約。2018 年 9 月，唐納德·特朗普的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在聯邦黨人協會舉行的一次演講中稱，國際刑事法院“非法、無效、極其危險”，並且“已經死了”。他甚至威脅道，如果國際刑事法院繼續調查駐阿富汗美軍士兵的行為，那麼會考慮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講話”，聯邦黨人協會，2018 年 9 月 10 日。<https://fedsoc.org/events/national-security-advisor-john-rbolton-address>.
12. 例如律師、法學家、政治人士、企業領導人等。
13. Antoine Garapon, Pierre Servan-Schreiber (sous la dir.), *Deals de justice.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 l'obéissance mondialisée*, PUF, 2013, p. 6.
14. Pierre Lellouche, Karine Berger, “Rapport d'information sur l'extraterritorialité de la législation américaine”, Assemblée nationale, 5 octobre 2016, p. 132.
15. 地緣經濟戰略的定義是“利用經濟手段促進和維護國家利益，並產生有利的地緣政治結果”。Robert D. Blackwill,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Belknap/Harvard, 2016, p. 20. 布萊克威爾在布殊政府期間任美國駐印度大使，哈里斯曾和他一起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工作。
16. Jean-Marc Leclerc, “La DGSi s'alarme de l'offensive américaine contre le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Le Figaro*, 14 novembre 2018.
17. “Future-Proofing. The Bank Risk Agenda. Global Risk 2018”,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février 2018.
18. Chiffres tirés d'une étude du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cité dans Édouard Lederer, “L'Amérique a fait payer cher la crise aux banques de la planète”, *Les Échos*, 1^{er} mars 2018.
19. Geneviève Burdeau, Brigitte Ster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et sanctions unilatérales. Rapport général”, in Habib Gherari, Sandra Szurek (sous la dir.), *Sanctions unilatérales, mondialisation du commerce et ordre juridique international*, Cedin-Paris X Nanterre, Montchrestien, 1998, p. 164.

20. 2015 年 7 月，伊朗與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德國在維也納簽署協議。在這項協議中，伊朗方面承諾大幅限制其軍用核計劃，以解除對其實施的主要國際經濟制裁措施。
21. 2018 年 5 月底，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提出了 12 項條件，作為與伊朗之間恢復信任關係的前提。這些條件從未被列入 2015 年簽署的伊朗核協議，等於要求伊朗投降：包括完全停止鈾濃縮活動，從敘利亞撤軍，與也門停止接觸，放棄對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政府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支持，停止對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威脅等。

第一部分

“山姆大叔”的域外管轄

美國領導人認為，經濟戰已經取代了冷戰。1989年，柏林牆轟然倒塌；兩年後，蘇聯解體。東西方對抗終結，美國自此把國家戰略重心轉向了捍衛經濟利益。1993年，美國比爾·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向美國國會請求將政府曾用來對抗敵人的手段和資源用以應對全球競爭。2001年發生的“9·11”恐怖襲擊未能遏制這一勢頭，恰恰相反，藉着打擊恐怖主義的旗號，自1993年啟動的經濟戰爭機器運行得越發肆無忌憚。打擊極端主義分子成為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實施霸權主義、干涉盟友經濟事務的最佳託詞。¹ 2000年年中，美國聲明，通過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獲取歐洲大陸上眾多銀行的用戶數據和轉賬信息開展間諜活動是合理且合法的，並且其藉着打擊宗教極端分子之名指派美國國家安全局在全世界範圍內部署監控系統。在美國當局看來，打擊企業不法經濟行為就是在阻斷恐怖分子的財路，從而讓他們沒錢實施恐怖襲擊。而對非民主國家的貪腐行為，美國則先下手為強，禁止他國與其進行經濟往來，理由是出於公平競爭的需要，以期維護世界經濟體系，這樣做亦是為了阻斷犯罪組織、黑幫和恐怖分子的財源。所謂的打擊恐怖主義、黑幫、犯罪組織、核擴散、獨裁專制、貪腐和違犯禁運令等名頭，

不過是為了讓美國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它的敵人開戰。美國當局部署多條戰線，各戰線協同推進，只是為了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霸權地位。

美國用一個像儲備齊全的彈藥庫般龐大的法律體系，使自己立於全球化的道德制高點，這種不成文的潛規則也維護着上文提到的那些協同戰線，甚至有人單純地認為，美國利用這些市場“伎倆”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²美國藉由域外管轄的合法化，讓它可以堂而皇之地用政治和軍事手段對任何國家施壓，無論是它的盟國還是敵對國。美國隻手遮天，肆意挑選那些可以與其結盟的國家，打擊不與其結盟的對手。歐洲屈服於“山姆大叔”的經濟霸權，只是為了得到美國的施捨。

註 釋

1. Voir Juan C. Zarate, *Treasury's War*,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15.
2. Antoine Garapon, Pierre Servan-Schreiber (sous la dir.), *Deals de justice. Le marché américain de l'obéissance mondialisée*, PUF, 2013, p. 30.

1. 《反海外腐敗法》 ——全世界圍捕腐敗企業

在美國，打擊貪腐本源自一起國內糾紛。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水門事件把企業貪腐行為曝光在公眾眼前，讓美國人民大為駭異。隨後美國國會決定通過一部法案——1977 年 12 月 19 日頒佈了《反海外腐敗法》。1975–1977 年，代表選民的眾議院議員目睹參議院議員由於“多國境外支付問題”¹ 不斷捲入聽證會醜聞，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反海外腐敗法》應運而生。《反海外腐敗法》禁止公務員在境外受賄。為了釐清這部法案的誕生始末，還要從那個年代的政治經濟背景說起。

1974 年 8 月，水門事件的陰霾尚未完全散盡，尼克遜總統的引咎辭職坐實了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境外企業和政黨間都存在權錢交易。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些腐敗交易，其中以洛克希德公司行賄案和香蕉門案影響最為惡劣。

洛克希德公司：行賄大師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航空製造業巨頭洛克希德公司以在多國毫無廉恥地賄賂中間人的行為而出名，上至身居要位的政客，下到幫派頭目，都受其“恩惠”，其腐敗網絡極為龐大，但其所作為在該企業高層看來不過是“收買”市場的必需之舉。

洛克希德公司的重要銷售主管約翰·肯尼斯·赫爾曾被派往日本，肩負向日本空軍售賣 F-104 戰鬥機的重任。為了更快速地完成任務，赫爾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日本黑社會頭目兒玉譽士夫接上了頭兒。兒玉譽士夫擁有一張極其龐大的關係聯絡網，他與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副主席極為熟識。日本自由民主黨本由自由黨和激進黨合併而來，而激進黨正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手締造並慷慨資助的。兒玉譽士夫又與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交好。藉着如此得天獨厚的人脈網絡，洛克希德公司不費吹灰之力就向日本空軍賣出了 200 架戰鬥機。而其競爭對手，同為美國企業的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則慘淡出局。

洛克希德公司發現，將政治、投機與犯罪聯結起來的這一做法十分奏效，便在民用航空市場如法炮製。時運亨通的洛克希德公司又恰恰趕上交際甚廣的兒玉譽士夫與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有交情，田中角榮本人又出自自由民主黨，因此只需引導這位大權在握的首相在洛克希德的訂單上輕輕劃幾筆便大功告成。全日空航空公司購入了許多洛克希德 L-1011 三星客機，作為交換和酬勞，兒玉譽士夫獲得了數百萬美元。

1976年，美國媒體曝光了這一醜聞。洛克希德公司的伎倆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為各大報紙的頭條。日本首相引咎辭職。在美國，這一事件引起了巨大轟動。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為國家安全憂心忡忡：中央情報局的秘密及其內部網絡的曝光對美國的國際形象極為不利。基辛格致信美國聯邦檢察官，令其遏制參議院報告中包含的敏感信息的擴散趨勢。隨後親自促成眾議院、檢察官與洛克希德公司的法律顧問——羅傑斯和威爾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秘密協商解決該案。²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跨國公司小組委員會³主席弗蘭克·丘奇卻沒有聽從基辛格的安排。1976年，他揭發洛克希德公司為了壟斷市場動用30億日元作為暗箱活動資金，公司內部將這一行動命名為“落花生”^①。這顯然名不副實：貪污者所貪何止小小的花生。數百萬美元被其收入囊中，其中的一部分，約6億日元（折合約200萬美元），被用於賄賂日本政府官員。⁴

洛克希德公司並非唯一行蠅營狗苟之勾當的企業，但由於它的做法已成反面典型，所以定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在由弗蘭克·丘奇參議員牽頭組織、傑克·布盧姆具體執行的調查中，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與洛克希德競爭的航空企業）的總裁宣稱他亦受到洛克希德公司做法的影響，賄賂了多國公務員，其中包括一些歐洲國家的公務員。

① 英語中“落花生”亦可指代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譯者註

1975年8月15日，洛克希德公司醜聞被揭發的6個月前，弗蘭克·丘奇參議員曾向參議院負責銀行案件的同僚諮詢過一些相關信息，此時他已對美國飛機製造商洛克希德公司在歐洲市場的所作所為有所懷疑。隨即參議院就發現了洛克希德公司曾以向德國政黨領袖行賄的手段，向聯邦德國售出多架F-104戰鬥機。無獨有偶，在意大利和荷蘭，洛克希德公司也如法炮製。⁵這一案件帶來的惡劣影響已超出社會道德準則，輿論譁然，洛克希德公司的聲譽也受到嚴重衝擊，美國國會迫於壓力，決定出手力挽狂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另一醜聞又佔據了各大報紙的頭條，即香蕉門事件，⁶涉事企業向南美某個國家總統行賄，以求其盡可能少收取該企業的香蕉出口稅。

香蕉門：洪都拉斯總統發大財

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大的香蕉生產區，而美國則是其最重要的買家。換言之，香蕉出口價格有任何波動，都會給美國進口商帶來巨大影響。事情始於美國三家企業拒絕接受提高香蕉進口關稅。香蕉出口國聯盟負責協定和調整關稅，該組織就像一個香蕉出口卡特爾^①。1974年，這個聯盟的成員涵蓋中美和南美多國，如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馬。聯盟決定對每箱40斤香蕉收取1美元關稅。這

① Cartel 音譯，亦稱同業聯盟，是一種經濟壟斷組織。——譯者註

無疑會引起美國國內跨國公司⁷的怨懟，它們威脅要撤出市場。掌握着生殺大權的生產國並不理會它們的抗議。然而，同年，洪都拉斯卻通過了一項規定香蕉關稅為每箱 50 美分的法律，不久後又毫無預兆地將其降至每箱 25 美分。

美國當局對此表示極為驚訝，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此展開了調查。戲劇性的突發事件為調查贏得了很多時間。1975 年，美國三大進口企業之一的聯合商標公司的總裁伊萊·M. 布萊克自殺。通過調查他生前的舉動，美國市場監管機構證券交易委員會很快就查清了為甚麼洪都拉斯的關稅會突降。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發現，聯合商標公司以 250 萬美元賄賂了時任洪都拉斯總統奧斯瓦爾多·洛佩斯·阿雷利亞諾。250 萬美元對該公司來說着實是一筆巨款，但與回報相比還算值得，算下來這為該公司節約了 750 萬美元。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還顯示，該公司向一位意大利高層官員行賄 75 萬美元，以求阻止意大利降低進口價格。

事實上，對於這種賄賂行為，證券交易委員會本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讓其感到困擾的是，這些錢並沒有計入公司賬目。在當時，美國法律並沒有把貪腐行為定為一項罪行。相反，向持股人隱瞞各種信息司空見慣，即使是賄賂中間人這種重要信息。

比起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制裁懲罰，聯合商標公司更擔心這一事件對公司聲譽的影響。也正因如此，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負責該公司案件的律師們刻意接近美國國務院的斡旋人，讓他們對證券交易委員會施壓，把事態平息下來。他們的主要論據是，

這一事件既有損涉事企業，又讓美國在外交舞台上顏面無光。但這一做法並未奏效。1975年春天，媒體還是曝光了聯合商標公司的這起醜聞。⁸

航空製造業和農業並非被腐敗荼毒的兩個特例行業。1977年9月，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顯示，逾400家美國企業曾有可疑或非法的轉賬交易。“不少企業供認曾對外國政府領導人、政客或政黨行賄，金額累計超過3億美元。”⁹報告表達了對喪失道德感的企業家們和這些讓全體美國企業蒙羞的貪腐行為的惋惜。歷史充滿諷刺，調查顯示，大部分涉事企業的貪腐行為都不是為了和外國企業競爭，其目標往往是本國的競爭者。總之，報告顯示，這些經濟把戲玷污了美國的國際形象。

弗蘭克·丘奇參議員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比起美國老闆的道德感和良知，他更擔心美國的對外政策何去何從。“我們對公共良知或者私人道德感問題並不感興趣。讓我們備感焦慮的是美國的對外政策。”¹⁰美國企業的貪腐行為演變成了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因此美國國會決定出手整頓秩序。但如何禁止這些不法行為呢？當時沒有任何一條法律可以禁止這些賄賂行為，即使受賄的外國公務員觸犯了他們國家的法律，美國司法也無權干涉。

更何況，捲入醜聞的國家常常沒有財力、物力進行調查或者組織證據，“對於這些國家來說，實施調查着實困難，因為它們掌握不了證據。我們有這些證據，但是不能展開調查，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並沒有禁止這種行為”。¹¹在當時的美國，人們完全可

以貪腐賄賂，只要他們把一切都放在明面上。只有一種例外是法律所禁止的：任何意圖壟斷市場的腐敗行為。

那麼，僅僅呼籲廣大企業家的良知和道德感就夠了嗎？參議員們持否定態度，他們擔心如果坐視不管，這種行為會越發猖狂。為甚麼眾多企業節衣縮食也要行賄呢？因為歸根結底，它們並不會承受甚麼風險。微小的風險能換來巨大的利潤，所得遠償所失。民主黨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注意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因此鋃鐺入獄，並且僅有三位企業主管因行賄被解雇。更糟糕的是，即使醜聞頻出，像洛克希德這樣的公司仍然在持續攫取利潤。結論就是，要改變法律，並禁止對外國公職人員行賄。

有了這樣一部法律，參議員們才長舒一口氣，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這部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企業的競爭優勢。從此，企業只要展示其道德感，並且將專注度放在提高產品質量上就可以拿下合約。然而，凡事無絕對。如何保證在面對不服從美國法律的競爭者時，這個金科玉律仍然有效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它們遵守相同的法律。

美國希望其他國家也乖乖遵守它制定的規則。¹² 它甚至想幫這些國家借鑒自己的道路，尤其想將這套打擊國際貿易合約締結和談判中的貪腐行為的體系推廣出去。197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有關規範打擊多邊貪腐行為的決議。20年後，這一目標達成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通過了一項打擊對外國公職人員行賄的公約（之後我們再來說這件事）。

先回到最初這一步：1977年美國通過了這部法律。參議員們紛紛思忖是將強制企業申報行賄金額這一舉措寫入法條，還是簡單粗暴地明令禁止這種行為。當時美國政府採取了較溫和的手段，其最大的顧慮就是，在美國境外無法搜集到足夠多的證據。某些國家甚至會以危害國家利益和主權為由拒絕合作，還有一些國家會對制裁在其境內經濟活動較為活躍的企業感到不滿。

1976年，由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擔任負責人、經濟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直接領導的立法工作小組正式組建，該小組的任務是推出一部約束性不那麼強的法律。¹³美國總統希望這部法律僅要求企業公開申報它們行賄的金額，違者將被追究民事和刑事責任。這一舉措迫使企業必須要將情況告知其股東。這一法律的局限就是它的權限被嚴格限制住了，而且其執法範圍只在美國本土。傑拉爾德·福特通過參與國際事務不斷和美國的經濟夥伴商談共同遵守這一規則的可能性，並不斷推廣這一法律。¹⁴

福特最主要的反對者是民主黨的吉米·卡特。卡特強烈反對這一法律，他認為總統的回應太軟弱，對企業及其高層領導太過寬容。在1976年大選中，卡特作為競選人猛烈抨擊了福特的政策，甚至駁斥福特在某種意義上立法許可了腐敗賄賂。卡特當選後就立刻摒棄了福特的計劃，並將貪腐定罪量刑。美國國會議員們認為，“將貪腐賄賂定罪是抵制其不斷蔓延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對企業的限制最少的做法”。¹⁵

1977年12月，聯邦305號法案——《反海外腐敗法》被表

決通過，然而反對聲卻此起彼伏。這部法律最受人們質疑的地方是如何制裁發生在境外的違法行為，而且往往別的國家和美國的法律體系並不兼容。自《反海外腐敗法》通過以來，如何進行域外管轄這一難題就擺在面前。時任總統卡特深知這一點，他呼籲國際社會攜手合作，並推動其他多個國家在本國也通過類似的法律。¹⁶ 即使這樣，吉米·卡特依然聽到了一些美國企業的怨言，它們認為市場中仍廣泛存在着惡性競爭，外國競爭者依舊可以為所欲為、不受管轄。¹⁷

全世界範圍推行《反海外腐敗法》

《反海外腐敗法》全文有二十幾頁。它的執法範圍¹⁸ 包括外國公職人員、已註冊證券發行人、有權限呈交各類報表的人、各類領導人、行政高層、證券發行人或股東的代表或為他們工作的人的腐敗行為，以及上述人群以權謀私、瀆職違紀、收受各種形式的賄賂，包括各種口頭或書面約定承諾等，以操縱國際貿易或利用權力對公共代理人行使職權而構成惡劣影響或唆使其收受好處、違反其法律義務的，或協助證券發行人刻意為某一方佔有或保留市場或協助某方佔有市場的行為。¹⁹

《反海外腐敗法》一出台便自帶域外屬性，無論是在哪裡發生的案件，只要涉事企業或其旗下任何一家分公司（抑或僅有一個貿易辦事處）與美國有某種聯繫，比如用美元進行交易等，美國司法部門就可以對其展開調查或實施制裁。

哪怕其間的聯繫非常小，比如一封簡單的電子郵件。2011年美國證券管理部門——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國司法部聯合向匈牙利電信公司開出一張數百萬美元的罰單，其貪腐行為涉及該企業在馬其頓和黑山的市場。匈牙利電信公司的母公司德國電信也因監管不力吃了罰單。與此同時，證券交易委員會還對匈牙利電信公司的三位前高管展開了調查，其中就包括公司的前任總裁埃萊克·施特勞布。這起案件和美國本土並無關聯，但美國司法部卻可以對這三位高管展開調查。為甚麼呢？因為其中一人使用在美國有服務器的電子郵箱發送了一封承認貪腐行為的郵件！2013年12月，美國紐約一法院判定證券交易委員會應用《反海外腐敗法》對這三人展開調查是合法的。換句話說，只要使用了在美國有服務器的電子郵箱，美國司法部就可以摧毀一個企業，制裁它的高層管理者和雇員。

美國司法部擁有了這個無懈可擊的搜刮金錢的“武器”，使用它可以調查任何有財務腐敗方面問題的外國企業，只要有一個模稜兩可的罪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查閱企業母公司的所有加密賬目，藉以得知其子公司的經營狀況。對財務腐敗問題的調查會使罪名疊加，讓罪行越發嚴重，如違犯《反海外腐敗法》、違反財務規範（賬目與記錄）、違反內部管控規定等。罪名越多，涉事企業受到的懲罰就越重，對其聲譽的影響也就越惡劣。

主宰開頭難

吉米·卡特明白，推動《反海外腐敗法》絕非易事。美國政

府內部已將此問題置於最高優先級談論數次，但無任何實質性結果。1975年，聯合國通過3514號決議，²⁰意在打擊所有違犯相關國家法律法規的腐敗行為，美國力邀聯合國成員國一起簽署相關國際公約。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將相關公約整理成2041號決議，並於1976年8月5日通過了該項決議。該項決議提出，要組建一個世界貿易反腐敗行為政府間工作小組。該小組組建三年後轉變為“非法交易特別委員會”。非法交易特別委員會起草了一份計劃書，旨在將企業視為法人追究刑事責任。美國大力倡議簽訂該計劃書，但無功而返。1979年，非法交易特別委員會由於各方意見出現分歧而停擺。“儘管大家，特別是美國代表付出了諸多努力，但各方並未達成共識……”²¹

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反轉呢？這一結果並不能歸咎於諸多發展中國家，它們雖然沒有直接對計劃提出疑問，但也並未實質性地參與談判。分歧主要源自西方陣營。法律和政治問題是阻礙協議達成的兩大主要因素，發達國家將國家主權看得比甚麼都重。哪一方的司法審判權能更有效地展開調查、追蹤案件並打擊犯罪呢？域外管轄之爭依然是大家關注的焦點。誰都不甘心屈從於一部外國的法律，讓其來監視自己國家的企業。“關於司法上的問題，很多國家的代表表示，即使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域外管轄機制，它也無法和本國法律相容。”²²大家已經開始懼怕美國會主導世界市場。

美國人依然沒有退讓。他們通過國際商會從中斡旋，繼續提倡這一主張。起初，國際商會組織了一項關於清查各國反腐敗立

法的國際調查。然後，它聯絡各個國家和企業，希望它們同意相關規定。²³ 很多跨國公司從中受到啟發並制定了自己的內部戰略方針。但也僅此而已。

由於 1979 年聯合國和國際商會的嘗試接連失敗，美國政府開始反思：是否要減輕對企業的約束，抑或是繼續提升《反海外腐敗法》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聯邦檢察官菲利普·海曼也在思考，究竟能否阻止美國企業出於搶佔市場、擊敗本國競爭者的目的進行的貪腐行為，²⁴ 而放任它們在面對外國競爭者時這樣做？《反海外腐敗法》的管轄界限究竟在哪裡？1988 年，《反海外腐敗法》的修正案允許在某一國家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向該國公職人員饋送禮物和提供好處。美國的各大跨國公司認為這依然是對法律的粉飾，遠不足以捍衛權益，他們呼籲要求統一法規。美國的遊說人員便重新拿起他們的“魔法棒”，再次出山，準備為實現這一目標奔走造勢。聯合國這條路行不通，他們就決定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入手，向其兜售他們的計劃。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如法炮製《反海外腐敗法》

一場曠日持久的遊說和司法外交拉鋸戰打響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終於在 1997 年 12 月 17 日通過了《反對在國際商務交易活動中行賄外國公職人員公約》（簡稱《反賄賂公約》），這部公約的條文幾乎照搬了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公約很明顯至少在四點上借鑒了《反海外腐敗法》”²⁵：在一

定範圍內允許外國公職人員收取酬勞；限制主動行賄（追查行賄人而非受賄人）；為了維護市場公平，對不法行為實施一定懲戒（不可出於私人目的行賄，制裁為行賄而偽造或隱瞞賬目和資產負債表的行為）；允許跨國執法。

公約第五條明確規定，簽約國要積極參與案件調查，即使這樣做會對其涉外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對於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調查和審訊，會在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規則和準則下進行，不受國家經濟利益、與別國的關係或涉事自然人法人身份的影響。”

美國的目的達到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經濟主體都加入了美國的反腐敗標準體系。“《反海外腐敗法》的推動者們大喜過望，這部法律不僅直接影響了打擊跨國腐敗行為的國際公約和國家立法，如今還成功地使美國有權約束很多外國企業。”²⁶ 真是完美的一石二鳥：美國法律在世界範圍推廣開來，還將外國企業置於美國司法的審判台上。

44 個國家批准通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反賄賂公約》，其中有 8 個國家非該組織成員。該公約自 1999 年 2 月 15 日正式生效。這是否標誌着美國司法開始對外國企業開槍了呢？從理論上講，美國方面展開調查是完全合法的。但在最初，美國刻意有所收斂。兩年後，2001 年的“9·11”恐怖襲擊導致一條新的戰線被開闢，美國領導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打擊恐怖主義上了。首先是軍事打擊，入侵阿富汗；然後是伊拉克戰爭。但美國也沒有停下向經濟領域進軍的腳步。

美國是如何做到的呢？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財源，打擊腐敗等一切疑似資助本·拉登及其他極端組織的骯髒交易。²⁷ 美國政府開始派出精銳力量追查這些款項的下落。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以及財政部工作人員變身為商業“特工”，他們的目標不只是企業、基金會或者近東和中東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的任務是掃描這個地球上經濟領域發生的大事小情。在 2000 年初，各大銀行和企業家進入了他們的雷達區。4 年後，第一批案件結案送審，美國國庫充盈了。罰款金額從每年 1 億美元上漲至 2010 年全年超過 18 億美元，直到 2016 年罰款金額從未回落至兩億美元。²⁸

與此同時，支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約的隊伍也不斷壯大。20 世紀 90 年代，一直迴避該問題的歐洲委員會於 1997 年 11 月 6 日簽署了一份決議，其中提出了打擊腐敗的 20 條準則，²⁹ 包括創建標準體系、監管機制和技術支持機制。同年，拉丁美洲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 34 個國家中有 33 個聯合簽署了《美洲反腐敗公約》，隨後 2003 年非洲聯盟也通過了《非洲聯盟預防和打擊腐敗公約》。唯獨亞洲缺席，沒有簽署該領域的區域聯合公約。³⁰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組織簽約受挫後，聯合國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在墨西哥梅里達通過決議，簽署《聯合國反腐敗公約》。³¹ 該公約與之前已簽署的公約相比並無太多變化，而簽約國卻增加到逾 170 個國家。該公約鼓勵國家間相互協助調查，在司法方面給予便利。

結 論

我並不怨恨一無所成或支持 40 年停火協議的人。我也十分理解那些拒不追隨戴高樂的人。他們偏安一隅，追求紙醉金迷的安穩日子，美其名曰人文關懷。後來他們吸取教訓，開始學“聰明”了，漸漸把他們所謂的生活理念灌輸給我們，荼毒、污染着我們，讓我們學得卑躬屈膝、不思反抗、逆來順受。

—羅曼·加里《黎明的承諾》

自 20 世紀初就有一種罪惡侵蝕着歐洲。這片大陸呈現出強烈的不適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向美洲大陸苟延殘喘地尋求保護後，它已失去自信，這種不適在整個 20 世紀蔓延，直至反殖民浪潮襲來。“顯然，歐洲大陸憧憬着被美國資本供養，”保羅·瓦萊里寫道，“其政策都是圍繞着這一目的制定的。”¹ 2016 年 10

月，隨着一位億萬富翁入主白宮，歐洲大陸對美國溫情的最後憧憬和幻想破滅了。

然而，唐納德·特朗普並沒有推出甚麼新的政策，他只是延續了之前幾任總統的做法，率先舉全國之力發動經濟戰的並不是他，而是列根、布殊父子、克林頓和奧巴馬。投票通過美國域外管轄法律的也不是他，而是所有之前的美國總統。人們斥責他實行經濟保護主義。誠然，在他的授意下，美國政府於 2017 年通過了 90 項貿易保護主義新措施，世界上所有該類型的措施增長至 467 項，單單美國就佔了 20%。²“在所有主張推行貿易壁壘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在 2017 年比 2016 年通過法令更多的國家。”比 2016 年多了 6 項，比 2015 年多了 4 項。³美國在經濟上重整裝備，蓄勢待發。⁴儘管如此，挖掘出經濟戰這一戰斧的並不是特朗普而是諸位前任總統。

幾十年來，美國總統們一直延續着要把歐洲變為美國附庸的政策方針，美國想要把歐洲徹底變為它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傀儡。美國從不掩飾它對歐洲大陸這個美國起源之地的地緣戰略上的野心。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的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就詳細概述了這一點。為了維持世界霸主地位，阻止任何競爭者的崛起，美國在對外政策上需要保證三點：“避免其附庸國之間產生摩擦，並保持它們在國家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一些敏感問題讓它們自行決定；阻止激進派組成反對聯盟。”⁵歐洲也一直扮演着被馴服的附庸的角色。激進派主要指的

是俄羅斯。早在很久之前彌撒結局已然注定，但歐洲精英們卻總是裝聾作啞。直到另一種壓力出現了，那就是美國的域外管轄法律。“這種域外司法政策，”法國共和黨議員布魯諾·赫達約寫道，“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首先是外交層面，使用如此手段將美國法律強加於歐洲國家，使其進一步淪為美國附庸。伊朗就是一個值得吸取教訓的例證……此外是經濟層面，這種政策旨在向美國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處以巨額罰款，以此方式削弱它們。”⁶

現在，美國的目標沒有變，變的只是方式與方法。在財稅改革的促進下，特朗普解凍了美國企業海外被凍結的 1.4 萬億美元，並承諾對回流美國的資本只收取 15.5% 的稅。他授意企業在歐洲市場上搜刮搶掠。繼阿爾斯通和德希尼布這兩大法國工業支柱深陷美國司法機構的泥淖，而不得不破大財免災後，厄運又將會降臨到誰的頭上呢？

在法國政府默許下建立起來的這堵橫亘大西洋的牆能否幫助法國遮風避雨呢？2018 年 2 月，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宣佈，擴大蒙特伯格法令的執法範圍，該法令旨在保護外商投資的法國戰略資產，並賦予國家組織相關方協商談判的權力。它涵蓋了新興科技（人工智能）、空間、數據資源存儲、微電子技術和金融市場的技術基礎領域。⁷ 法國也應鞏固在某些敏感企業中持有的“黃金股”（或“特殊股份”），這些股份賦予國家在某些企業戰略決策（研發部門位置、知識產權轉移、投標流程等）中擁有監管權和否決權。但法國如何能螳臂當車？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對唐納德·特朗普 2017 年 5 月 26 日和 27 日在意大利西西里 G7 峰會上的發言表示認同，翌日即宣佈：“我們完全依賴別人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作為歐洲人，我們應該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⁸ 兩大陸間的鴻溝自此顯露無遺。但誰可擔當捍衛歐洲經濟利益這一重任呢？歐洲人是否幻想着美國人的核保護傘也能保護歐洲的經濟利益呢？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在 2018 年 5 月索菲亞峰會開幕式上隱晦地表示：“實話實說，歐洲要感謝特朗普總統，因為正是他打破了我們的所有幻想。他讓我們意識到只有自己動手，才能豐衣足食。”

如果特朗普沒有當選又該如何？歐洲是否能繼續幻想尋求美國的庇護，抑或自己終將掌握自己的命運？在那些天真幼稚的歐洲領導人看來，這些問題尚且有待商榷，殊不知他們只是美國股掌間甚至是全球化浪潮中“有用的傻瓜”。

特朗普的意圖昭然若揭。他認同甚至宣揚新自由主義最陰暗的一面：人人為己，自私自利。這種毫無底線、瘋狂競爭贏得世界上霸主地位的做法讓幼稚天真、憧憬美好的歐洲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也迫使歐洲企業甚至歐洲國家不惜弄虛作假、訴諸暴力來保護並贏得市場份額。法律只是美國的一種手段，它雖不是唯一一種，但效率卻毋庸置疑，特別是用來對付那些依然相信法律公平正義並多年來忽視其對經濟致命影響的歐洲人。

特朗普逼着其他國家走上角鬥場。“這就是個老小子的伎倆，”一位美國官員說，“他重重給你一拳，如果你還擊，他就會

問：‘咱們還是不是哥們兒？’有的國家做出反擊，特朗普就退讓了。而反觀歐洲，卻徒勞地向特朗普反覆示好，結果只是一無所獲。”歐洲精英們不能再迴避觸及國際經濟關係本質和發展方面的論戰了。暴力不能壟斷政治，貿易也並不總能緩解國家間的觀念衝突。真相已為歐洲敲響警鐘。如果歐洲不想繼續對這位不可結交的特朗普只進行口頭上譴責，而是想要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地抵制乃至衝破美國司法和經濟桎梏；如果歐洲不再履行與伊朗的協議並公開放棄其在伊朗的企業，結局將是注定的：歐洲將不復存在。如果歐洲昂首挺胸，對美國這位歐洲盟友發起還擊，那將證明歐洲模式才是正確的，因為公道高於法律。

2018年12月17日

於巴黎

註釋

1. Paul Valéry, “Notes sur la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Europe”, in *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 Folio-Essais, Gallimard, 2017, p. 28.
2. “Protectionism. Trade Wars Reloaded”, étude Euler Hermes, février 2018.
3. 同上。
4. Robert D. Blackwill,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Belknap/Harvard, 2016.